

门诊日记

潘群飞

人上了四十,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。以前与常见小病的较量中,胜多败少,现在经常被它偷袭得手,还纠缠不清。感冒刚有苗头,就吃药打针,体温还是居高不下,不敢掉以轻心,决定去医院看看。

因东三环建高架封道,在细雨中兜了一个大圈子,才见到一脸焦急等在那儿的妹妹。她沮丧地说,专家号没了,挂了个普通的,可以吗?我说,无所谓,这种小病,何必去专家那儿扎堆?普通呼吸内科人不是很多,很快就轮到我了。四十左右的男医生询问了我的病史和症状后,就开了几张检查单,包括胸部CT。他补充说,本来拍一张X光胸片足够了,可你无法站立,躺着拍又不清楚,只好拍CT。

CT室队伍排得老长,只好等。一病人家属正焦急地打手机,命令电话那头的人给院长打声招呼,她父亲在住院。挂了电话,她对旁人说,上医院一定要熟人的,钱花得少,手术做得也好。有人听了频频点头,有人不置可否地笑笑。我不以为然,这是病人心理和家属心态问题引起的误解。有了熟人,医生态度稍微亲热些,多嘱咐几句,这是人之常理,但在诊治原则上,不会有太大的区别。

各项检查结果还好,CT显示下肺有点感染,白细胞略有下降。医生说,主要是病毒性感冒引起的,肺炎不严重,挂三天盐水可以了。我有点不放心,觉得药开得太少了,追问了一句,三天后肯定没事了?医生回答,百分之百的事谁能保证,但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顿了一下,又嘱咐我一句,多喝开水,快乐些。我听了轻松不少,随口说了一句,谢谢医生。医生微笑着点点头。围着的几个病人似乎有点意外,有人还小声嘀咕,他们认识的。——他们真的想多了。

输液室也几乎座无虚席。那些婴儿头上缠着好几层胶布,像刚从前线下来似的,静静地躺在大人的怀里。一位坐高背椅子的护士正轻轻吁气,她刚连哄带骗地给哇哇大哭的儿童扎完针。桌前的牌子上写着儿童注射专用字样。看着那张淡定认真的脸,我有



些感慨。她每天不知要多少次面对大哭大闹,面对细皮嫩肉,还有一旁大人心疼、不安的眼神。这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、极好的心理素质,更要有颗柔和温善的心。我静脉细,本也想让她扎的,想到这些,我没麻烦她,让她趁空休息一下,去了另一个注射台。

那护士年纪更小,从胸牌看可能是医学院的实习生。她看看我的左手,放下,又让我右手捏紧拳头。反复轻轻拍打,摩挲,手背只隐现几根绿色的血管。伴着一股强烈的刺痛,针进去了,血没出来,进退摇摆一番后,无奈地把针拔了出来。再拿起左手,遭遇与右手几乎相同。妹妹在一旁虽没说话,但轻轻的“啧啧”声已响起了。不好意思哦,小姑娘弱弱地说完,红着脸向我笑笑。我说,没事,慢慢来,我的静脉是很细的。护士又笑了,如释重负中透着谢意。

也许是她压力释放,心情大好的缘故,第三回终于一针见血。后来,几次路过我身边,她都会停下来看看针,问我疼不疼。替我拔完针,没走多远,她突然回头告诉我:那个比你细的人,我也搞定了。看着那张灿烂俏皮的笑容,我不由得想,我们充满信任和理解的那段对话,不仅愉悦了她今天的心情,也许也会成为她今后美好的记忆,甚至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和困惑时的慰藉吧。

窗外,绵绵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,高大的棕榈树和整齐的黄杨叶被雨水清洗得格外翠绿,墙角几朵粉红的花儿在风中一颤一颤,娇丽欲滴。真美。

出租车司机

汪燕红

周六提着刚在市场买的两天分量的小菜和一只西瓜,在马路等公交车,已到午餐时间,街上人流车流川流不息,独不见公交车和出租车。

我两手轮流交换拎着菜和瓜,手指被购物袋坠得变了形色。终于有辆出租车过来了,忙招手叫停。车停在我身前,司机探头出来,问我去哪,我报了地点后,他说好的,上车吧。

前座和后座都已经有人了,我刚在后座空位上坐下,司机就开始对着车前的方向盘发牢骚。我转头看了看车内乘客,一个忧郁地看着车外,一个漠然刷着手机屏幕,司机的声音响在车厢里,像唱着独角戏。我开始以为司机在用车载无线对讲机和他的同行交流,可听不到对讲机里传过来的声音,就狐疑着响应了一下,对他遭遇的不公表示同情和安慰。

司机是一个城市的喇叭,好像每个出租车司机都很健谈,时事、杂论,司机都有谈不完的话题,从你一上车就热情和你交流看法观点。我喜欢和司机交谈,他们消息灵通,态度热忱,因着共行一段路的缘分,总给我一种亲切感。和他们交谈特轻松,下车时话题自然而然终止,各行其道,从此成为陌路,也许一辈子就此再不相遇。

前座右座的乘客相继下车后,我央告司机在培训班外稍等片刻,把我和小儿载送回家。他沉默片

刻,问我,培训班下课了?时间久不久?我向他保证,只耽误一小会儿时间,我会跑着去接,跑着过来,以最快的速度来回。他沉吟片刻,同意了。

从学校开过,看见旁边挂起的中考横幅和三三两两等待的家长,他打开话匣,滔滔不绝,比较起他小时候的家长和现在的家长对小孩的重视程度,唏嘘自己那会儿,一个人玩着泥巴,就这样长大了;又愤世嫉俗地批判着现在有些家长对小孩的过度溺爱,以为孩子读书好就万般好,可走上社会,光读书好又有什么用?谈兴正浓时,车在培训班前停下了,他又不放心又问了句,你去一下,时间不会花很久吧?感受到他的焦虑,我肯定地说,就一小会儿,马上来。

拉着小儿跑上车,司机有点不好意思,说,你的速度好快。我敷衍了句,是啊,就打探起儿子的考试情况。他在旁听见了,说了几句俏皮话,就留出空间,给我们母子交流。

到达目的地后,我思忖着跑了这么远的路,就掏出100元。他说,你有31元零钞吗?我不敢相信地反问道,31元吗?从上车到培训地点就超过31元了,更何况还有培训地点到家的那段路程。我猜他没把我拼车时的那部分车费算进去。

他嗯了声,没过多解释。我找出31元零钱,诚挚道谢。看着他一声不吭,绝尘而去,我的心里暖暖的。

在乡村理发店

王林军

休息日回乡下老家,母亲见我头发怪长的,就说你去剃个头吧。反正也没事,就向理发店走去。

到店,进门,见已有三四顾客,剃头师傅招呼我坐下稍等。趁这间隙,我开始细细地打量起理发店来。店不大,十来平方米左右,店内摆设依稀还是儿时的模样:一把木头做的剃头椅,沿墙壁一溜摆开的几把凳子,墙角桌子上挨挨挤挤的十来个热水瓶,以及一罐茶叶、几个杯子……所不同的,是原先理发店一角还有一只水缸及一口小土灶。剃头师傅一天的头一件事就是给水缸挑满水,然后在小土灶上烧水。剃头店费水,既要给顾客洗头,又要供应等候顾客的茶水,偶尔也有路过的乡亲进来灌点茶水,所以那口小土灶一天到晚几乎没怎么歇着。不过剃头师傅除了清早烧开水,其它时间几乎不用管它,因为有等候的顾客帮忙添柴、灌水。现在店里已接进了自来水,烧水也换了电茶壶。还有,原先理发店里有一台收音机,似乎整天都咿咿呀呀地放着越剧,现在已换成了电视机。

正在我打量的时候,电茶壶里的水“滋滋”地冒起泡沫来,剃头师傅还没动,已有等候的顾客起来拔了电源线,然后往热水瓶里灌水,灌好后还给端着茶杯的各人续满水。这情景差不多还是记忆里的模样,不由让人心里一阵温暖。

陆续有人出去,也陆续有人进来。进来一位大叔,瞧着面熟,却想不起到底是谁。大叔进门后,瞧着店里墙壁一角,冲着剃头师傅嚷道:“怎么阿三,年前5元,年后涨成了8元。”我随着那位大叔的目光看去,果然墙壁上写着“理发8-10元”。被唤作“阿三”的剃头师傅,被大叔这么一问,仿佛是做了错事,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;还是在座等候的各位乡亲给他解了围,说是阿三好几年都是这个价,现在稍稍涨些,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
说话间,一个年轻后生搀扶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进来。见了老人,在座等候的各位乡亲纷纷“阿哥”、“阿叔”的叫着打招呼。后生见店里有这么多人等候,一个劲地问剃头师傅轮到爷爷还要多长时间。原来理完头,他还着急带老人去城里办事。有人说:“既然有事,那就给老爷子先剃吧。”大伙儿听了纷纷附和。老爷子一个劲儿地说着:“这怎么好意思,这怎么好意思。”

理发店里还是记忆中的那般热闹亲切。尽管电视放着,但乡亲们看电视、聊天儿两不误。聊天的内容包括稻谷桑麻、家长里短、今古传奇。现在电视、报纸、电脑普及,比起过去乡亲们的信息更加灵通,所以话题更广泛。剃头师傅手上忙活着,嘴里也不闲着,不时地参与着大伙的聊天。

轮到我了。往那把宽大厚重有些年头的剃头椅上一坐,亲切温暖的感觉再次从心底油然而生。剃头师傅几十年的老手艺,可能理不出时尚的发型,但剃个平头啥的游刃有余,没一会工夫就把我的头发修剪得棱角分明。

出门来,走在村庄的小道上,感觉一身清爽。



本版摄影 青衫客 总第5651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2014



我们经常跟美联、路透、CNN的记者约好,去联合国办事机构外守着,和武器核查人员玩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。他们一动,我们就上车跟踪。对方发现我们后,就会想办法甩掉我们,在某个岔路口,他们的车队突然一分为二。我们那时欠缺足够的通讯设备,只能凭借常年的斗争经验形成的默契来行动,比如美联的车在前面,他们会从车窗里伸出手,指着某个方向,示意我们分头去追。

当然,核查小组也会阶段性地召集记者发布信息,往往却是:“我们这次的成果依然是高度怀疑,但这次并没有查到有效的证据,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”

伊拉克当局也会利用媒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有一次,穆赫辛把我们召集起来,参观一架西方国家指责说是“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”的无人机。

飞机停在巴格达郊外一家普通工厂的空地上,看

上去像是架大号航模,机翼也就一米多长。冀惠彦是军事记者,一看就知道,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装芥子武器或化学毒气弹,其实就是架洒农药的无人机。

眼看一切核查都无功而返时,一个惊天大转折出现了。

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,出示了据说可以证明伊拉克拥有、制造和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证据,一个代号“曲线球”的情报人员成为关键人物。据说他是伊拉克的前科学家,曾经在生产研制化学武器的秘密部门工作过,后来从伊拉克转到约旦,叛逃到德国,将情报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。

有一段录音,是两个人在电话里交流。一个人说:“那个东西送到了没有?”另一个人回答:“上校,你放心,我已经送到了很安全的地方。”鲍威尔解释,他们是在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这段电话被监听并且记录下来。

鲍威尔的证据让全世界哑口无言,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件事,仿佛就此坐实。鲍威尔演讲时,我们挤在穆赫辛的办公室看电视转播,我看见,穆赫辛不再不可一世,那种大限将至的表情,很真实地浮现在这个伊拉克新闻官员的脸上。

2003年2月中下旬,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下了通知:下一个礼拜,第一批使馆人员要撤出了。

我有种不祥的预感,我们有可能会被勒令撤出。那个时候,中国在伊拉克的记者已陆续撤离,除了我们,只剩下新华社巴格达分社,由我的老同事张兰华带队。

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:如果新华社也撤,我们留不留?怎么留?

整个报道组都很担心,我给他们鼓劲:“之前花那么大力气进来,就是要守到战争爆发那一刻!能坚持多久,咱们就要顶多久!”

可形势不容乐观。有一段时间,每天做完报道后,我和冀惠彦就坐在拉希德饭店的窗台上,透过夕阳余晖,看着窗外的底格里斯河,看着巴格达钟,看着整个巴格达市区,谈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:怎样才能留下来?

我分析,如果使馆和新华社都撤,台里领导肯定要考虑我们的安全,号令班师的金牌就很可能发过来。我们不想前功尽弃,于是制订了一整套“留守战略”。

第一步要发“安民告示”。我不断给台里发传真,汇报工作决心。我特别强调全体人员状况良好、斗志高昂,各项工作正常进行,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报道体系,并未受到紧张局势的影响。同时我也表现出很强的安全保障意识,包括如何紧急避险、战时物资囤积、预先了解撤离路径等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